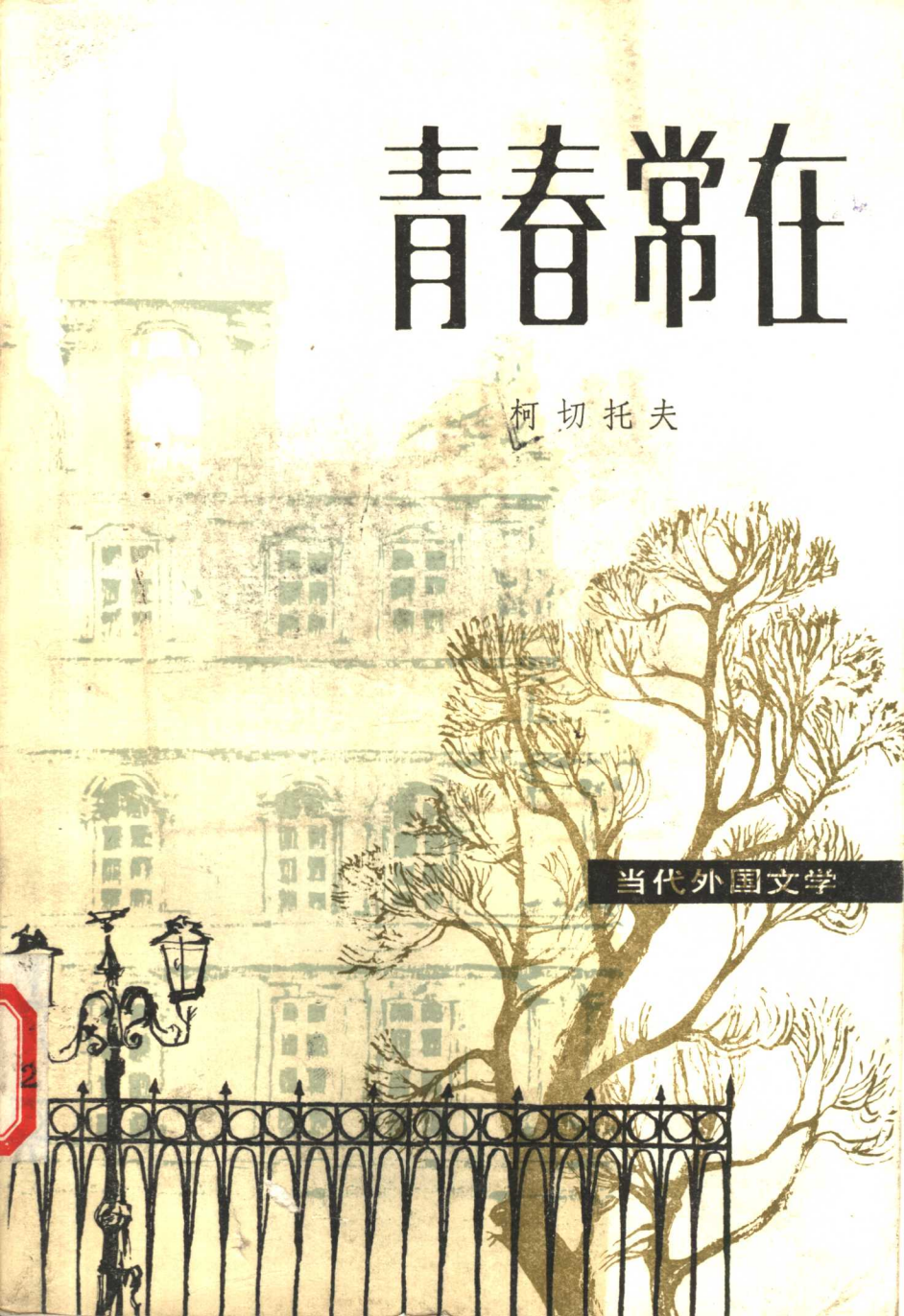


青春常在

柯切托夫

当代外国文学





青春常驻

〔苏联〕柯切托夫著

佟轲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ВСЕВОЛОД КОЧЕТОВ
МОЛОДОСТЬ С НАМ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0

责任编辑：程 文
封面设计：周建民

青春常在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房山印刷厂印刷

字数411,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9 $\frac{13}{16}$ 插页2

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书号10208·82

定价 1.45 元

第 一 章

父女俩默默地、缓缓地挪动着脚步，登上自己家住的三楼；巴维尔·彼得罗维奇走在前边，奥丽雅紧跟在后面，中间只相隔一步。

他们从墓地穿过整个冰天雪地的城市，步行回到家里。一路上，他们就象现在这样，缓缓地，默默无言地，一前一后，迈着十分悲痛的一步子。从东边湖面上吹来的凛冽寒风在房顶上呼啸着。阴森森的大街上，二月的暴风雪盖住电车道，拖着长长的尾巴，不时地吹打着行人的面颊、膝盖和脊背。奥丽雅觉得街上的严寒钻进了她的心房，手脚早就冻僵了，心也冻得似乎再跳动一次就要停止了。

多么想顺着楼梯跑上去，超过爸爸，和往常一样，抢先去按电铃的那个白色按钮呵！

但是，今天勿须着急了。二十三年前，年轻的母亲第一次抱着自己的裹在粉红色襁褓里的女儿走进去的这扇房门，今天，不会再有人来开了。当时，妈妈没有让爸爸抱女儿，因为年轻的爸爸到产院来的时候，穿着一双崭新的皮鞋，一路上，在落满湿漉漉的深秋落叶的地上一走一滑，滑了好几个趔趄。

不，这回再也不必忙着去开如此熟悉、如此亲切的、包

着褐色漆布的那扇房门了。当奥丽雅还在上七年级或许是六年级的时候,有个淘气的男孩子用大头针在门上划了“奥丽雅+舒里克=?”的字样。

也许,爸爸也害怕这间空荡荡的屋子。巴维尔·彼得罗维奇走到门前停下来,背朝着奥丽雅一动不动地站立良久。奥丽雅在门上又看到那个小淘气想要知道却始终没有得出答案的公式。奥丽雅心不在焉地又瞧了瞧那些写在墙上、栏干上和楼梯台阶上、见过成千上万次的字样“柳勃卡是坏蛋”、“柳勃卡是傻瓜”、“柳勃卡是细长腿”。打扫院子的人每星期都将这些字样擦掉,涂掉,但无济于事,擦掉了,过不了多久,又出现了。楼上住着一位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歌唱家的狂热崇拜者恨透了他那个已经成了半老太太的老婆,因为她不许他们闯进家里,不让丈夫接电话,把他们撒着香水的信从门上的投递箱里取出来,看也不看就扔到楼梯上。

奥丽雅没有发现爸爸从兜里掏出钥匙开门,就看见已经敞开的门和盖在前厅镜框上的黑白条布了。巴维尔·彼得罗维奇等女儿迈过门坎,啪的一下关上门,走进前厅。奥丽雅跟着走进来。爸爸异乎寻常地佝偻着腰坐在窗前的安乐椅上,穿着大衣,戴着皮帽,穿着套鞋。大衣领高高竖起,领钩全扣着。多年来,妈妈总是让爸爸这样做,担心他害病,因为爸爸经常感冒。落到这个最亲最亲的人的皮帽、衣领和眉毛上的雪融化了,细小的水珠,映着夜晚微弱的灯光,在面颊上滚动着。他的目光凝在那把高椅子的椅背上。妈妈生前总喜欢坐在这把椅子上,在桌旁干家务活,倒茶。

家里暖烘烘的,但奥丽雅却感到比大街上还冷。她想,她

此刻应该扑到爸爸跟前，拥抱他，安慰他。但是，她做不到这点，她没有这种力量，就连她自己也在等待，时刻都在等待着别人来安慰自己。她心里深深隐藏着这样一个希望：所有这一切突然变成一场恶梦，变成是什么人跟他们搞的一场不怀好意的恶作剧。

她关上餐厅的门，让爸爸独自呆在里边，自己走进爸爸书房，也没有脱掉衣服，而是穿着大衣，戴着毛线帽，穿着高腰套靴，在凉冰冰的黑色沙发上躺下来。窗外飘着鹅毛大雪。挂着窗帘的书房里，一片朦胧，屋角里的大电表有节奏地、慢慢地滴嗒滴嗒地响着……奥丽雅又仿佛听见妈妈入葬时铁锹咔嚓咔嚓的碰击声和冻土敲打棺木的冷酷无情的蹦蹦声，这声音将永远永远地埋藏在她的脑海里。她躺在沙发上，蜷缩成一团。谁说她，奥丽雅二十三岁了？不，不对。她还不到十岁，她才八岁……七岁。她真想不顾一切地号啕痛哭，朝着整个屋子，朝着整个世界喊叫，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她这可怕的不幸遭遇。

但是，这些天来，她已经哭得再也哭不出声了，她只能低声抽泣着。她一边抽泣，一边打起瞌睡来。

突然间……——是的，她不是无端地怀有这一线希望的，当然喽，她自己明白，这不过是幻觉！——前厅里响起清脆急促的铃声。一听就知道这铃声是谁按的：是妈妈在按电铃。

“妈妈，妈妈回来了！”奥丽雅使劲喊起来，随后就惊醒了。

是爸爸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挂在桌旁墙壁上的妈妈的肖像在望着奥丽雅。外面，路灯亮了，在路灯摇曳的光线下，妈妈的肖像显得活灵活现，妈妈很年轻，留着短发，象个男孩子，身穿制服——不知为什么，妈妈爸爸都把这种制服叫做少年见

习突击手服，——斜挎着宽宽的武装带，胸前佩带着共青团团徽。妈妈仿佛在摇着留短发的头，美丽的眉毛高高挑起，眼睛里迸发出快活的蓝晶晶的火花。

电话铃响着，几乎不间断地响着，偶而也停一停。前厅里也不时地响着铃声，但那声音一点也不象是妈妈按电铃。因此，无论是奥丽雅，还是爸爸巴维尔·彼得罗维奇，谁都没去开门。父女俩不想见任何人。入葬时可怕的冻土块一落在棺木上，他俩就心照不宣地悄悄避开所有的亲友和熟人。现在，朋友们当然会为他们感到不安。但是，难道他们以为，对这样不幸，还能有什么办法能够安慰吗？

奥丽雅从沙发上站起来，打开屋里的吊灯，走到妈妈的像前，仔细端详妈妈脸上的每个特征。只有童年时她才这样看过这张最亲切、最可爱的面孔，那时她觉得世上没有比妈妈再聪颖、再漂亮的人了。从十五、六岁起，奥丽雅就不再走到妈妈像前这么看了，不再这么仔细、爱慕地端详妈妈的像了。大概是从那个淘气包在门上划了那个神秘的、激动人心的、没有得出答案的加法公式时起，就不再这样做了。

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奥丽雅感到妈妈的关怀和照顾成了负担。她需要的是急于到冰场去滑冰，到学校参加晚会，晚会上邀请了兄弟学校的男生；在街头巷尾的约会，意义极其重大的谈话；谈完话，不是在奥丽雅家门口久久徘徊不愿散去，彼此谁都不想说一声“再见”，或者是在一通争吵之后一赌气说声“算了”不欢而散。

后来，开始了比中学时代严肃得多的大学生活。关于学校里的事，奥丽雅跟妈妈谈得越来越少了，学校里的生活使她对

妈妈的印象逐渐淡薄了。当然，妈妈总归是妈妈，是最可亲、最可爱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只有当奥丽雅生病，妈妈坐在她的床前护理她，给她喉部敷上湿布，在本子里每天记录三次体温，深更半夜摸黑把盛桔汁的缸子送到奥丽雅干裂的嘴边时，她才体会到这一点。

奥丽雅身体健康，很少生病。她认为，妈妈是为她，奥丽雅能过舒适生活而活在世上的。妈妈早就什么都不需要了，已经四十岁了，为什么还要穿这种样式的皮鞋和连衣裙，还要去看戏呢。只有她，奥丽雅才需要打扮和参加文娱活动，只有她才需要去剧院看戏，因为她年轻，风华正茂，前程无限。

同学们有时在奥丽雅家里聚会。这些客人到来之前，奥丽雅总是对妈妈表示亲热，哄着妈妈，当然，妈妈就忙着给他们烤面包，做菜，似乎客人是妈妈的，而不是她，奥丽雅的；妈妈把饭桌摆得很别致。每当这时，奥丽雅总是想法把妈妈和爸爸支开，嫌他们妨碍她。看着妈妈的眼睛，奥丽雅晓得妈妈很想留下跟年轻人一块儿跳舞唱歌。瞧，妈妈那身材，那蓬勃的朝气和可爱的面孔，难道能一眼看出她跟奥丽雅的女同学有多大差别吗？

但是，奥丽雅铁着心肠，尽量不去看妈妈的眼睛。

想起来多可怕啊！她奥丽雅竟然高兴妈妈和爸爸去疗养院疗养。她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从这一天起，她将成为家里的主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妈妈呀，亲爱的妈妈，”奥丽雅抚摩着相片的玻璃框，低声自语，“你能回来该多好啊……只要你能回来，我就只跟你一起去看戏，只跟你一起跳舞，唱歌；我只需要你，只需要你一

个人，任何时候也不需要其他任何人。我多想跟你一起度过每一个夜晚，海阔天空地聊天，尽情地谈谈心里话呀。亲爱的妈妈呀，你可知道，你对自己的女儿了解得多么少啊，她心头有那么多少女的秘密瞒着你呢……”

奥丽雅把手从冰凉的玻璃像框上移开，好象在等待妈妈回答她的恳求。她觉得，妈妈正在以责备的目光望着她，仿佛在说：“孩子，那你对我了解得就多一些吗？你有几次问过我的生活经历呢？”

奥丽雅听到窗户上咯的一声，浑身哆嗦了一下。她走到窗前，撩起窗帘的一角，一瞧，玻璃上粘着个雪团。接着又打来第二个，响声更大。

奥丽雅看见下边马路上有个黑影。那人正弯下腰，看样子，又抓起一把雪，准备再往窗户上打。外面还下着小雪，看不清是谁。奥丽雅也不想知道是谁。也许是沃洛佳或是阿纳托利。反正是谁都无所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多不了解别人的心情啊！奥丽雅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猛然想起了他们俩。过去，她喜欢过沃洛佳，也喜欢过阿纳托利。但是，爸爸……爸爸啊！“你想嫁给他吗？”爸爸发现奥丽雅多次提起沃洛佳或是阿纳托利的名字，突然这样说，“是个挺招人喜欢的年轻人。不过，你看他下颏？下颏挺怪的！这是大自然的造化。小伙子的下颏生来就长成两瓣。请原谅我，奥列奇卡^①，这不是下颏，哦……怎么跟你说才好呢……鬼知道怎么说！”或者谈到阿纳托利时，说：“是个长着招风耳朵的小伙子。我看他象是高射炮手炮台上的测音器。总之，是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挺惹人喜

① 奥丽雅的爱称。

欢的。”

爸爸这么一说就全完了。奥丽雅看沃洛佳时，使劲盯着他的下颏，好象沃洛佳仅仅是由这个下颏和一道深沟儿构成的似的。一瞧阿纳托利，也叫人难过得要哭，这不是阿纳托利，简直是个测音器。

爸爸不知为什么连想都没有想到，她，奥丽雅有一天终归要嫁人的。“这太可怕了！”他跟妈妈气愤地说，“那样一来，她就得给那个长粉刺的小伙子织毛袜，烫油污的裤子，煮味道难闻的杂鱼汤了。她对他的愚蠢而任性的要求都得照办。有什么理由这样呢，为什么，为什么她要离开家，远走高飞，一辈子跟着自己的——说句不好听的——君主和偶像屁股后面转呢？”

“那咱们俩呢，巴甫里克^①？”妈妈微笑着说，“你早就忘了我给你织毛袜的时候咱们俩的心情了……”“咱们俩！”爸爸愤懑地说，“你可找到对比了！咱们俩！咱们俩是另一码事。咱们俩那时候一切都是另一种样子。”

早在八年或十年前，爸爸和妈妈的关系不知为什么就使奥丽雅非常感动。她趁着家里没人，悄悄地溜进爸爸的书房，用钥匙打开写字台左边的小柜，里面收藏着用细绳系着的厚厚几捆爸爸和妈妈互相写的信。有的信封里还有照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从那以后，奥丽雅就再也没有去看爸爸写字台左边那个小柜了。“咱们俩那时候一切都是另一种样子”，回想起爸爸小柜里的书信和照片，她耳边又想起爸爸的这个声音。奥丽雅打开屋子里的吊灯，坐在安乐椅上，又打开绿色灯罩的台灯，从写字台里拿出一捆用细绳系起来的书

^① 巴维尔的小称、爱称。

信，奥丽雅眼睛里马上流出两滴泪珠，啪啪地落在一个旧信封上。信封上的地址是妈妈那只可爱的手写的，妈妈的字迹又大又清晰，妈妈给奥丽雅留的字条用的都是这种笔迹：“汤和第二道菜用你的小被子盖着，吃吧！吃完了，把餐具洗洗。”或者“我今天回来晚，替我干点家务活。别让爸爸吃不上饭。”

电话铃继续响着。大片的雪花扑打着窗户。在楼梯过道门前，人们的脚踏得瓷砖地啪啪响，书房屋角里的电表每隔三十分钟响一次。可是，奥丽雅什么也听不见了。这些往日的书信和照片在奥丽雅眼前展现出爸爸妈妈生活中的一桩桩往事。

这是爸爸战争时期写的一封信，是他从哥尼斯堡^①寄来的。他写道：城里，战火还在燃烧，中央街区还在进行战斗，但他的炮兵营已经退出战斗，驻防在湖岸上，士兵们脱下军装，用初春冰冷的湖水洗掉身上的硝烟。信里请妈妈原谅，信纸这么脏，是由于被哥尼斯堡的战火硝烟熏的。

这封信充满朝气和活力。爸爸在信的结尾说，战争即将结束，他很快就要回家团聚了，“到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该多美满啊！大家都会羡慕我们的。”奥丽雅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她和妈妈读了这封信高兴得跳了起来，母女俩一起给爸爸写回信。那封回信也收在这捆信里。妈妈先写自己的生物学研究及工作情况。接着又谈了各种各样的幻想，描绘着即将到来的战后重逢。

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爸爸战后回来，既没有什么雪青马和乐队，在爸爸乘坐的列车进站时，也没有花束和妇女们抛向空中的女风帽。妈妈当时正在食品店排队买沙糖。爸爸拎着

① 即现在加里宁格勒市的旧称(1947年7月4日以前)。

皮箱，扛着口袋，走进商店，给妈妈机关打电话。他已经回过家，只在门前转了转，没人开门。妈妈听到身后有人叫“柯洛索娃公民！”她，这位唯物主义者，巴甫洛夫院士的信徒，反对科学中主观主义的不屈战士，回头一看，就晕过去了。

奥丽雅从一摞信中又抽出了一封。确切些说，这不是信，而是几条备忘录。是爸爸临上前线时留给妈妈的。他嘱咐妈妈立即撤到遥远的后方各州去，把奥丽雅也带去。后来才知道，妈妈并没有照爸爸的嘱咐去做。她没有跟随研究所迁往西伯利亚，而是去军队医院当了医生，也没有把奥丽雅送到那里去。

备忘录里有许多项要求。有的妈妈照办了，每次写信都要跟爸爸说；有的没有照办，不管爸爸来信中怎么生气也无济于事。

后面的信，有的奥丽雅早就忘了，有的由于她年幼看不懂，有的事情她根本不知道。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爸爸妈妈经常分开。爸爸先到一个城市，等他安顿好，妈妈再带着小奥丽雅和更小的柯斯嘉去那里。他们先后到过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哈尔科夫、切利亚宾斯克、库兹涅茨克。他们参加过各种建设，跟一些人进行论战，向另一些人开展斗争。后来，多半是爸爸一个人到处奔波，因为妈妈进医学院学习去了。爸爸只是在假期和考试时才回来，因为爸爸也在学习，上的是钢铁专业的函授班。

读爸爸妈妈的信，要对着地图和翻阅现代史课本才能读得懂，因为信里有那么多城市名字，提到和评论过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重大事件。比如，奥丽雅无论在哪本书里都没见过象爸

爸从乌克兰寄给妈妈的信里讲农业集体化讲得那样详细。当时爸爸作为青年钳工曾跟工人小组一起到过那里。

奥丽雅又找到一张照片，是爸爸和妈妈站在木板台上的一个大肚圆铁筒旁的合影。爸爸穿着工作服，工具从膝盖上部的裤兜儿里露出来，头戴一顶拉到耳边的工作帽，笑容满面。妈妈身着整齐的帆布上衣和带褶的裙子，脚登俄罗斯式的靴子，头发用围巾包着。瘦小而苗条的妈妈也在微笑，笑得拘谨而惬意。她是混凝土搅拌机的记号员，那时才十六岁。她跟爸爸认识三天了。这张照片是爸爸的朋友，也当钳工的费佳·马卡罗夫拍摄的。妈妈在照片背面写下了这些说明。

当时把信放在兜儿里，已经磨得破旧不堪，有的成了碎片。信封上的地址，开头是“本市”，爸爸信里写的好象有点火气，莫名其妙。妈妈的回信也显得冷淡和若无其事。当奥丽雅看到“我不懂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我们将永远是朋友”这些词句时，不禁噙着眼泪微微笑了笑。哦，多么狡猾的妈妈！有一次，阿纳托利吐露自己的感情时，她，奥丽雅也是这样回答他的。奥丽雅也装着什么都不懂的样子，向他伸出手，说，我们只交个朋友吧！

妈妈和爸爸的通信以及他们的合影照片，是从妈妈和爸爸在混凝土搅拌机旁认识时才开始写的和拍的。当时，钳工巴甫卢沙·柯洛索夫是派来修理机器的。在这之前，妈妈和爸爸的相片都是单人照。奥丽雅瞧着一张站在古老的椴树树荫下的两排少先队员的照片。正中间，队旗下面，爸爸右边站着一个洋洋得意的小姑娘，昂首挺胸，穿着白衬衫，白袜子，刚刚遮住被晒得黝黑的瘦膝盖的短裙，整整齐齐地扎着红领巾——

后来，她叫奥丽雅也这样扎红领巾——长着两道严厉的眉毛。所有站在队旗下面的人，表情都很严肃。那时候，他们唱的歌曲也都是很严肃的。有时晚上，在妈妈和爸爸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们常唱起自己当年唱过的那些少先队歌曲和共青团歌曲。为什么，为什么每逢这样的夜晚，奥丽雅她总是跑去看电影，或是跟同学们去逛大街呢？现在已经记不起妈妈爸爸唱的关于奔驰向前，不到共产主义不停车的火车头之歌，关于布琼尼和第一个红军军官伏罗希洛夫同志之歌，关于那匹要去报告主人已经为工人阶级光荣牺牲消息的大青马之歌的歌词了。

父母的事，奥丽雅几乎一点也不了解。她眼前摆着他们收集在夹子里的奖状、荣誉证书、命令摘录，她只是看到诸如“成绩优秀”、“模范执行”、“发扬布尔什维克主动精神”等这样一些字样。这一切，奥丽雅仿佛是初次看到；即令不是初次，那也完全可以肯定是由于这样悲痛欲绝而使感觉第一次变得如此敏锐之后，才这样深刻地感到了爸爸妈妈一直在从事着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事业。在短短的一瞬间，奥丽雅父母那整个神奇的一代人现在好象都聚集到这里来，聚集到少先队队旗下，队旗上写着：“时刻准备着，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奋斗！”这一代人，透过那个穿白衬衫，长着两道严肃眉毛的小女孩的形象出现在她面前的。

奥丽雅低下头，看着杂乱无章地扔在桌上的文件和照片。此时此刻，对这个小姑娘来说，只要她的妈妈能够活过来，她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那谁也不需要的、毫无价值的生命。

书房的地板颤动了一阵。屋里轰隆一声，仿佛落下一颗炸

弹。奥丽雅跑到走廊里，大为惊异：是不是爸爸出了什么事？大门外，喊声从锁眼里传进来：“开门，开门，再不开，我就要砸了！”这声音好熟啊。奥丽雅打开门，满身是雪的柯斯嘉猛地闯进前厅。

“妈妈在哪儿？”他解下军大衣的皮带，解开衣扣，一边喊道，“我敲门，按电铃，用雪块打窗户，足足有两个小时了！妈妈在哪儿？”

奥丽雅垂下双手，站在弟弟面前。她多想一下子跑到他跟前，抱住他，紧紧抱住他的双肩。但她依然一动不动地木然地站着，柯斯嘉喊道：

“怎么通知我这么晚？我一辈子也不能饶恕你们！爸爸在哪儿？”

奥丽雅朝着餐厅那边使了个眼神。

柯斯嘉没有摘绿色的边防军帽，就走进昏暗的餐厅，在墙上摸了摸开关，打开了灯。地板上趟着几股水流。桌旁摆着坏了龙头的茶炊。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正面色苍白地站着，看着面前的茶炊。一见到柯斯嘉，他说：

“是我在黑暗里碰掉的，……今后可怎么办呀？”

二

大雪时松时紧，足足下了一周，到星期天终于停了。太阳出来，阳光驱走了暴风雪，城市上空缓缓浮动着一团团的青烟，窗台上的雪融化了。傍晚，屋檐下挂起了一串串细长的冰挂。

奥丽雅望着冰挂，很想跟柯斯嘉提起他们当年瞒着爸爸妈妈偷偷地咔嘣咔嘣吃那些奇妙的冰挂的事；有时他们吃得扁桃腺发炎，可谁都不向爸爸妈妈告状。但是柯斯嘉一坐在舅舅鲍罗廷上校身边（他在侦察部队服役），这时候，你跟他讲也好，不跟他讲也好，反正他什么也听不见，因为他一见到瓦夏舅舅，就光顾听他讲侦察兵的故事了。正是由于受了瓦夏舅舅讲的那些故事的影响，柯斯嘉从十年制学校毕业后，没有上大学，而进了边防军学校，当了中尉，几个月之前到边防地区服役去了。甚至遭到这么大的不幸（柯斯嘉两天来难过得愁眉苦脸），他也没有忘掉自己的瓦夏舅舅。他眼泪汪汪，一直瞅着瓦夏舅舅。

桌旁坐着许多人。尽管柯洛索夫一家人极力回避想向他们表示慰问的人，但到了星期天，却实在躲不过去了。从早晨起，奥丽雅的朋友们和女伴们陆陆续续都来了；傍晚，爸爸妈妈的朋友们和同事们也来了。桌上，奥丽雅倒的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茶早就凉了。作为主人的奥丽雅给客人倒完茶，就从桌旁走开，呆在凉嗖嗖的窗前。桌旁，她没有地方坐了，所有的椅子，除了妈妈的那把，都坐满了客人，大家就象事先已有默契似的，让妈妈那把椅子空着，谁也不坐。

“我受不了，真受不了，实在受不了！”谢拉菲玛·安东诺夫娜·舒瓦洛娃仰起头，用饱含痛苦的语调说。

奥丽雅非常喜欢谢拉菲玛·安东诺夫娜·舒瓦洛娃，但是特别不喜欢他的丈夫鲍里斯·弗拉基米罗维奇·乌拉尔斯基。大家在桌旁坐着，他一直用小勺在盛果酱的小高脚盘里合弄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精致的过滤嘴香烟。他一言不发，不

插嘴，只是不断地点头，表示赞同谢拉菲玛·安东诺夫娜的话。

怎么说得上喜欢不喜欢呢？但奥丽雅就是不喜欢他。她不喜欢他的一切。他实在过于彬彬有礼，过于殷勤。有人说，这是职业习惯：他是州报的摄影记者！摄影记者应该彬彬有礼和殷勤，应该给人留下最愉快的印象，不然，被他拍照的人就会愁眉苦脸。提起鲍里斯·弗拉基米罗维奇，还有人说，他是个美男子，谢拉菲玛·安东诺夫娜就是看她长得漂亮才爱上他。奥丽雅听了只是惊讶得耸耸肩：又是这一套——漂亮！只有理发馆的橱窗里才陈列这种蜡做的美男子。当然，橱窗里陈列的都是些比鲍里斯·弗拉基米罗维奇年轻的人，他们的牙全是真的，而不是镶的。奥丽雅永远也不会喜欢这种象琉璃草一样的蓝蓝的眼睛，那种又亮又软、用烫发钳子烫得蓬蓬松松的头发。这一切都是假的、臆造的、矫揉造作的。奥丽雅觉得，鲍里斯·弗拉基米罗维奇总是装模做样，在他那职业性的彬彬有礼和谦虚客套外表的后面，隐藏着一种完全相反的东西，他的善良只是给别人看的，他在家里说不定会任意叱责可怜的谢拉菲玛·安东诺夫娜，或向她暴跳如雷呢。

奥丽雅非常怜悯谢拉菲玛·安东诺夫娜。身材匀称的谢拉菲玛·安东诺夫娜，虽然已经四十七、八岁了，却显得那么年轻。看样子，她很会保养，很注意保护脸上的皮肤，把自己的长发染成淡亚麻色，浑身上下收拾得整齐利索。这样一个女人怎么能够容忍身边有这样一个讨厌的乌拉尔斯基呢？

“是呀，谁能受得了？”鲍罗廷上校回答谢拉菲玛·安东诺夫娜的话说。